中日間社會科學的翻譯

（代序）

金耀基

本文是爲實藤惠秀、譚汝謙及小川博幾位先生所編「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及「日本譯中國書綜合目錄」二書有關「社會科學」翻譯部份所寫的「代序」。這二本大書刻正在排印中，不日將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耀基　誌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於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且最稱圓滿具足。但是，中國自來不排斥外來文化，其最顯明者莫如東漢以降引進佛學之事。明清後，泰西之學更源源內輸。中國吸收外來文化有多樣的方式與媒介，但譯書可能是最有

影響力的一種。事實上，佛學與西學之來中土，產生廣泛的文化上思想上的刺激與反應，並豐富了中國的文化傳統，莫不與譯書息息呼應。而譯書與文化發展的重要性，印之於日本，可能更爲生動有力。日本通過譯書而與中國和西方文化的交流，可說不斷滋潤和發展了具有特色的日本文化。

中國近代之譯書，開始於十六世紀，多偏於宗教，唯自十九世紀中葉後，誠如錢存訓先生所說，譯書已成爲中國走上現代化的一種特殊措施。當時譯書之重要動機，殆爲富國强兵，其着眼點則在西方之科技，從而譯品之絕大多數屬自然科學與應用科學之範疇。二十世紀以還，文化意識與思想取向丕然一變，中國知識份子顯然把根本改造中國的重點轉移到政治社會和人文方面。於是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的譯品乃告增加，且凌駕於科技譯品之上。這一趨勢迄今有增無減。

在近代中國整個譯書事業中，自以迻譯西方之著作爲大宗，此誠因西方自十七世紀在世界舞臺逐漸得勢，而中國之欲模倣西方而又超越之的心理使然。在這段時間裏，中文之譯爲西文者顯然不成比例，形成西方文化之入超現象。從文化之出入超來說，其中最勘玩味的是中國與日本間互相譯書的歷史現象。衆所周知，中國與日本的文化關係是非常密切而特殊的。自秦漢以來，中國對日本言，一直是文化的出超國。日本的「大化改新」（公元六四六年，大化二年開始）可以說是中國文化在日本的開花結果。長期以來，日本的知識份子都可以直接閱讀中國書，因此翻譯可能非十分緊要和迫切。日本之「譯」中國書很難確定始於何時，但早期譯品，大都屬人文學方面者，而社會科學方面的極少。事實上，一八九五年前，據現有的資料看，在社會科學方面，日本只譯過八本中國書，數量微乎其微。至於中國對日本文化則縱不必有君臨的心態，也不感到有特別的吸引力。因此，毫不足訝異的，在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結束）前，中國只譯過一册日本社會科學方面的書。

就日本譯中國社會科學之書來說，一九一二年是重要的一年。從這一年起，隨着中華共和革命的成功，日本對中國社會政治的了解顯然感到殷切，因此，對中國社會科學方面的著作特別重視，翻譯的工作乃隨之加多。我懷疑這時翻譯之加多，除上述原因外，

可能一方面是因爲中文書籍越來越多用白話文，增加日人閱讀之困難，一方面是因爲日本知識界對漢文的理解力逐漸減弱之故。中日戰爭（一九三七年）開始後，日本的中譯工作更達到新的高潮，這似乎與日本軍閥之侵華戰爭需要有關。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五年間，平均每年譯中國社會科學方面的著作達二十九本之多，而一九四六年以後，譯書速率雖然放慢，但每年仍達二十本之數。

就中國翻譯日本社會科學著作來說，則一八九五年是重要的一年。這一年以後，中國翻譯日本的著作，除抗戰時期（一九三八到一九四五）外，每年翻譯多達二十餘本。自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七八年，仍然維持每年十五本的紀錄。中國對日本的「文化上國」心理是一八九五年放棄的。日本經甲午一役，國勢大振，以蕞爾三島，躋身强國之林。這對中國是一大刺激，並深悟日之崛起，非屬偶然，變法維新（一八六八年），其來有自。從而，中國激起學習日本之運動，或更確切的說，學習日本所以富强之運動。本世紀初竟有萬名中國學生羣渡扶桑。這在譯事上也反映得十分明顯。從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到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此一時期從日文翻譯的書（指一切著作），高達中國所譯外國書籍的總數百分之六十，儼然凌駕翻譯歐西著作之上，顯然出現了日本文化入超的現象。而所譯的日文著作，則又以社會科學爲主，特別是關於政治、經濟、教育，軍事、法律與社會者。

總的來說，日本的社會科學的著作之中譯影響中國甚大。中國社會科學中的有些名稱，如社會學、經濟學皆係源自日本，而影響當代中國至大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之思潮，其最重要的徑路亦爲日本。

中國與日本間的譯書事業雖已有三百年的歷史，但是却一直沒有完整的記錄，這不能說不是一大憾事。這個遺憾到今天才由實藤惠秀、小川博和譚汝謙幾位先生的努力彌補起來。這個佳訊我是由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同事譚汝謙博士處先得到的。譚先生自新亞書院畢業後，曾留學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後又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深造，他的學術興趣是近代日本史和中日文化關係史。近年來，我知道他從事編纂「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和「日本譯中國書綜合目錄」這二本大書。他對於譯書的資料，不論是中譯日、或日譯中，都千方百計的去蒐集，眞正是「上窮碧落下

黃泉、動手動脚找東西」，做到心到、手到、脚到的勤奮境地。爲了配合今年十二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主辦的「中日文化交流國際研討會」，他更日以繼夜地爲這二本目錄的出版而專注直往。前幾天，汝謙兄告訴我這二本目錄已編纂蔵事，囑我爲其中「社會科學」部份，寫一序言。寫序我不敢當，但覺得有些感想可說，同時，也高興有一個機會做這二本目錄（社會科學部份）的第一位讀者，可以先睹爲快。

當我翻看這二大本目錄時，不期然而然地對它的編纂者產生敬佩和感謝的心情。這二本目錄資料蒐集之富，也許已窮盡目前可能發現的所有書目。一點也不誇張，「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包括自一八八三年到一九七八年近百年中出版的六千種中譯日書，可以稱得上是「清末以來中譯日書的總目」，而「日本譯中國書綜合目錄」，包括自一六六九年，特別是自明治維新以來，出版的三千餘種日譯中書，則不愧是「明治維新以來日譯中書之總結算」。這一對姊妹篇，無疑已從譯書的角度具體地展現出三百餘年來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個清晰面貌。這樣的工作，最得益的是讀者；而對於研究中日文化的人說，更是最有參考價值的工具書。我相信它們對於增進中日兩國的了解是有很大助益的。實際上，這二本目錄的出版，本身就象徵了中日學者的精誠合作。實藤惠秀先生是「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的首創者，而「日本譯中國書綜合目錄」的發起亦始自實藤惠秀先生。這二本書目的部份資料的蒐集還得到韓國洪淳昶與日本松井大作及小川博三位先生的協助，而二書大部份資料的蒐集與統籌整理，全力使其底於完成者，則是譚汝謙先生。

我個人不但有先睹爲快之樂，並且從汝謙兄處得到一些中日譯書的統計性的資料，使我對中日譯事方面有進一步的了解。在這裏，我想把中國與日本間譯書的工作再作進一步的比較觀察。

我們如以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到一九七八年這一一〇年的期間來比較，則日本譯中國社會科學著作得一〇〇一種，平均每年出版九・一種；在同一時期裏，中國譯日本社會科學著作得一五二八種，平均每年出版一四・八種。最可注意的是，不論在中國或日本，社會科學著作都佔其譯書總數的第一位。若進

而分析中日兩國彼此所譯社會科學著作的內容，則均以政治與經濟佔最高比例。在日本，政治有五〇四種，佔社會科學五〇・一九%。其次是經濟，共一三六種，佔社會科學一三・五四%。在中國，政治有三一三種，佔社會科學二〇・四八%，經濟有二九三種，佔社會科學一九・一七%。所不同者是，在日本，社會科學之外，翻譯最多的是文學（九八六種）、哲學（五六九種）、宗教（二〇一種）。反之，在中國，社會科學之外，翻譯最多的則是應用科學（一四〇五種）、語文（一〇一四種）、史地（五九一種）及自然科學（五八二種）。從這些數字中，我們可以說，中日兩國彼此都重視對方的政治經濟的著作；但日本對中國的文哲方面也十分注意，而中國對日本則似偏重於其科技。

最後，從譯書的性格與品質來看，我們可以發現，中國譯日本的社會科學著作，係以譯介西洋知識學說爲主體；亦卽中國是通過日本來接觸西方之知識的。因此，中國不免戴着日本的眼鏡來觀察西方和世界的事物，此就中國通過漢譯日書以了解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一事，便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例。反之，日本譯中國的社會科學之著作則以掘發中國國情爲主體，並且較能掌握中國重要的著作，如中國歷代重要的政治經濟著作多已譯成日文，如唐吳競的「貞觀政要」，清魏源的「海國圖志」，都有多種譯本。另一方面，日本之翻譯又偏重中國各地經濟的調查與考察，此在中日戰爭期間尤然。當然，這些翻譯大有助於日本國民對中國之了解，其動機自有純正而可敬者，但有些翻譯則似爲配合日本侵華戰爭之目的者，這種現象不能不說是長遠的中日翻譯史上之不幸的一個章節。我們深以爲中日兩個文化應該有更多的交流，兩國間的翻譯應該爲豐富彼此的文化，增加彼此的了解爲目的。誠然，中日兩國之翻譯，應該不是爲了「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而是爲了「知己知彼，相悅以解」！我謹以此馨香祝禱之。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二日於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